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路径:以非洲经验为例^{*}

周星灿 杨宝荣

[内容摘要]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路径主要包括从自身经验出发形成问题意识并提炼为学科命题,围绕具体问题发展具有一定解释范围的中层理论,以及在跨区域对话中推动构建多元知识共同体。非洲是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实践场域。与20世纪的“反殖民”目标不同,21世纪的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围绕“去殖民”展开,从“非洲如何应对和适应国际秩序”转向“如何从非洲经验出发重写国际关系理论”。其去殖民性内核表现为反思主流西方理论的历史性,确立非洲经验的主体性,并实现政治经济的实质自主。围绕这一目标,相关研究形成了关系性本体论、以“认知自由”为核心的认识论,以及本土知识驱动的方法论实践。然而,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仍面临外部知识霸权、内部路径依赖以及学科成果整合不足等困境。总体来看,非洲经验既是学术创新,也是维护自主发展权的斗争,对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非洲 国际关系理论 自主 权力 去殖民性 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 周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宝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6)05-0131-23

任何权力结构都依赖一套知识体系来使其合法化,要解构权力,首先必须解构这套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近年来,全球南方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

^{*} 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同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经济”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34)的阶段性成果。

发展需求,逐步推进具有自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相关研究突破既有理论的问题设定与概念范畴,广泛发掘不同文明的思想资源,将东亚儒家天下观、印度曼陀罗体系、非洲乌班图思想以及拉丁美洲依附与解殖思想等转化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资源与理论话语,并据此重新思考国家、权力、秩序与发展等基本问题。这些探索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形成挑战,更推动全球南方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关系知识生产,并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国际发展话语重构、南南合作机制建设及区域一体化等实践形成日益密切的互动,呈现出理论创新与国际实践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特征。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是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本文所称“非洲国际关系理论”,是指将非洲的历史经验、现实实践与思想资源作为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通过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与前提,重新提出问题、建构或修正概念并形成理论解释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它是多股相互交织的知识共同体与批判思潮在非洲议题上的汇合,其构建主要由四类力量推动:一是非洲大陆本土的国际关系学者;二是在西方院校任职、以非洲经验改造主流理论的“非洲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①三是以阿米塔夫·阿查亚与巴里·布赞等为代表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者;^②四是以后殖民与去殖民视角反思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学者。^③ 这些探索具有一定的共同关切,但在理论立场、方法选择与研究重心上呈现出多样化。基于此,本文旨在讨论三个核心问题:非洲如何通过自主知识生产解构殖民性权力结构?其理论创新如何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重塑学科范式?非洲经验如何体现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

① Kevin C. Dunn and Timothy M. Shaw,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Thomas Kwasi Tieku, *Governing Africa: 3D Analysis of the African Union's Perform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Christopher S. Clapham,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Scarlett Cornelissen, Fantu Cheru and Timothy M. Shaw, eds.,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③ Branwen Gruffydd Jones,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Karen Tucker, "Unraveling Coloni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ledge, Relationality, and Strategies for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2, No. 3, 2018, pp. 215 ~ 232.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非洲经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意义,也为认识全球南方崛起所伴随的知识体系变革及国际秩序转型提供重要的认知工具。

一、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路径

围绕全球南方经验展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在逐步形成若干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其创新逻辑主要体现在“问题如何产生、理论如何形成、知识如何扩展”三个方面。

(一) 界定核心问题并形成学科命题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问题设定方式的变化。与以往对既有理论问题展开回应的做法不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具体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出发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差异逐渐显现。差异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寻找和发现差异由此成为理论学者的重要工作。^① 在此意义上,问题设定方式的调整,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

设问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从各自经验出发提出新问题,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学科命题。首先,相关研究逐渐从既有理论框架中抽离出来,以不同地区的历史处境与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界定研究对象,使本土经验不再仅作为西方理论的补充材料,而开始参与问题本身的界定。这一取向的一大体现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知识运动,其核心在于推动学界将研究视角拓展至非西方世界。^② 其次,学者们在不断比较与概括的过程中,逐渐将区域经验转化为具有更广泛解释意义的研究议题。例如,爱德华·约尔丹重新界定“中等强国”概念,指出新兴中等强国具有区别于传统中等强国的特征,从而使这一概念超越特定国家经验而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③ 迪恩·赫尔登休斯则

① 秦亚青:《差异平议:试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1期,第11页。

②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14, pp. 647 ~ 659.

③ Eduard Jordaá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Politikon*, Vol. 30, No. 1, pp. 165 ~ 181.

提出“孤立国家”概念,并构建分析框架以对不同国家分类比较。^① 再次,新的问题在相关研究持续积累与学术交流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逐渐稳定。不同研究围绕相似问题展开对话,使原本分散的经验转化为可讨论的议题集合,并进一步上升为具有解释力的学科命题,而这些命题也为后续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起点。

(二) 聚焦具体问题并建构中层理论

在“设问”之后,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进一步表现为从宏理论到中层理论的重要转向。中层理论通常聚焦特定的研究领域或问题,是宏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体研究纲领或理论分支。^② 全球南方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历史经验、制度环境与发展条件上差异显著,若直接以“全球南方”作为整体建立覆盖范围过大的理论,容易忽略不同经验的具体条件;而从特定问题出发形成解释范围相对明确的中层理论,可以在保留经验差异的同时,对有一定共性的现象形成理论解释。

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层理论的建构存在多种模式。刘丰指出,中层理论既可以在既有范式下围绕具体议题形成理论分支,也可以跨越不同理论边界围绕特定概念或现象形成综合性解释,还可以通过对经验案例进行分类,归纳同类现象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而形成较为具体的因果解释。^③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出现与上述路径相近的理论探索。例如,拉丁美洲长期围绕“自主”问题展开理论建构。巴西学者埃利奥·雅瓜里贝与阿根廷学者胡安·卡洛斯·普伊格立足拉美国家在不对称国际结构中的现实处境,将国家自主能力及其实现条件作为核心问题,并由此发展出具有拉美特色的自主理论传统。^④ 此后,阿根廷学者罗伯托·拉塞尔与胡安·加布里埃尔·托卡特利安针对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重新阐释传统自主概念,提出“关系自主”,进一步界定了“自主”概念的理论内涵。^⑤ 中国学者提出的“局部等级”理论则聚焦东亚安全秩序,考察

① Deon Geldenhuys, *Isola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 ~ 27.

② 刘丰:《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 页。

③ 同上,第 7 ~ 9 页。

④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lejandro Simonoff, “The School of Autonomy, Lat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49, No. 186, 2017, pp. 39 ~ 89.

⑤ Roberto Russell and Juan Gabriel Tokatlian, “From Antagonistic Autonomy to Relational Autonomy: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from the Southern Con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5, No. 1, 2003, pp. 1 ~ 24.

地区大国实力变化及其与地区安全等级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国家战略行为,将解释范围限定于特定地区秩序及其行为机制。^①虽然拉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和建构方式不同,但都体现了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提炼的取向。因此,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具体经验中的问题出发,通过概念重构与理论解释,在地方经验与宏观理论之间建立联系,使具体经验逐步转化为具有一定解释范围的中层理论。

(三) 平等对话构建多元知识共同体

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最初都源于地方性知识,只有成为共享知识后才具有普遍适用性。^②国际关系理论若要更充分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现实,需要回应不同文明与社会在全球互动中形成的多样经验与规范资源。然而,仅依托地理归属或政治立场形成的学术联系,往往难以维持稳定的知识生产。因此,以共同问题意识为基础形成的知识共同体正在兴起,并推动跨区域学术互动持续展开。

知识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依赖不同知识传统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平等对话,另一方面需要制度化机制提供支撑。就知识对话而言,不同地区虽然历史进程与现实处境各异,但在秩序、正义与发展等问题上具有相似关切,为跨区域知识交流提供了基础。全球南方学者通过对不同文明传统中相似关切的比较阐释,使本土经验具备更强的理论阐释力。例如,通过对冲突调解机制、区域治理模式或发展策略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被转化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概念与分析框架。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通过构建思想文化共同体,塑造新型国际知识体系。^③就制度化机制支撑而言,持续的学术互动有助于整合相关概念与研究议题,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跨区域知识网络。从现有学术实践来看,围绕全球南方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形成若干学术网络或知识共同体。代表性案例包括金砖国家

① 刘若楠、孙学峰:《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1期,第56页。

② 石斌:《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困境与出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期,第21页。

③ 王珩、周星灿:《全球发展倡议背景下的中非知识思想文化共同体构建》,《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4期,第42页。

智库合作机制、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知识网络等。这些平台以共同问题意识为纽带,推动着跨区域知识交流与合作。同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形成的学术交流机制,如全球南方国家智库论坛、全球南方智库对话会以及金砖国家智库论坛等,也为不同经验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制度基础。多样化的学术联系表明,全球南方知识生产正走向跨区域互动。在此基础上,具有共同问题意识的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处在一个常规科学阶段,或者说是多个研究纲领并存的阶段,这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平淡期,也是一个理论复兴的孕育期。^① 多元知识共同体由此成为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

二、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性内核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相关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前述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即从具体经验出发,经由问题提炼逐步进入理论讨论。同时,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是一种生成中的知识,尚未形成稳定且制度化的学科范式。在此背景下,其理论内核以去殖民性为主,可以概括为知识解殖、认知重构与权力解放三个维度。

(一) 知识解殖:反思西方理论的历史性

喀麦隆历史学家恩格尔伯特·姆文格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指出:“若政治主权必不可少,那么在当今非洲,科学主权或许更为重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身仍需实现去殖民化。”^② 因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解殖”首先指向摆脱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性支配。这也意味着,非洲在国际体系中参与权力博弈,需要以知识的解放为出发点。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首先需要区分“理论”与“学科”两个层面。前者主要

①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 年第 1 期,第 41 页。

② Engelbert Mveng, “Récents Développements de la Théologie Africaine,” *Bulletin de Théologie Africaine*, Vol. 5, No. 9, 1983, p. 141.

是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用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后者涉及课程设置、研究方法、期刊发表、学科史书写与知识评价体系等制度与实践。非洲学界的相关反思,既指向具体理论命题的经验局限,也涉及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取向与评价标准。因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考察既有西方理论为何难以充分解释非洲经验,也由此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与理论方向。通过剖析国际关系学科与殖民权力的关联可以看到,尽管西方理论的构建和运用过程中所蕴含的“西方性”或“地方性”特征相当明显,^①但其仍然以“普适性”为伪装,将殖民逻辑嵌入学科体系,遮蔽非洲经验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既有理论在解释非洲问题时所面临的局限。

一是历史叙事的局限性。传统国际关系史叙事通常将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造为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开端。这种叙事以欧洲历史进程作为理解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坐标,使非洲前殖民时期多样的政治秩序与历史经验在国际关系史叙事中被边缘化。同时,1884 年—1885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对非洲殖民扩张与领土争夺制度化的重要历史节点。柏林会议后列强对非洲的地理切割,意味着对非洲自身政治秩序与知识体系的直接否定。

二是概念建构的等级性。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长期以白人中心主义为基调,通过文明等级、发展阶段、理性标准等话语,把非洲固定在“落后”“缺席”“未完全文明化”的位置上。塞缪尔·亨廷顿在列举世界主要文明类型时,将“非洲文明”置于“可能还有”的不确定位置。^②这种对“非洲文明是否存在”的疑问,与“发达/不发达”“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现代/传统”等二元分类共同构成了对非洲及其他全球南方地区的等级化表述。这种分类在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并通过持续的表述影响北南关系及对南方国家的认知与政策实践。^③在发展话语层面,现实本身已经被“发展话语所殖民”。^④由此,非洲的发展困境不仅是在特定

① 石斌:《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困境与出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9.

③ Roxanne Lynn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2~3, pp. 127~162.

④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特定含义,更为外部干预提供了知识上的“正当性”支撑。

三是学术制度的规训性。在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中,英语学术期刊的垄断地位、以西方数据库为核心的引文索引体系,以及围绕欧美高校与智库构建的全球学术网络,共同形成了对非洲学者的象征性规训。关于非洲研究的学术成果很大程度上需要在既定范式的框架内发言,才能获得可见性和合法性。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符号暴力”理论为理解当代知识殖民提供了有力工具:统治阶级只需“让自己所支配的体系自行运转,便可施行支配”。^① 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在二战后完成“美国化”,进一步说明西方理论的支配并不只存在于概念之中,更嵌入课程体系、研究标准与学科身份之中。^② 因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解殖,不只是对个别概念与理论的修正,更是对一个在机制上早已通过“定位他者”和“身份塑造”来确立并巩固自身霸权的学科体系的挑战,并要求重构知识标准、话语结构和制度安排,使非洲成为主动的知识生产者。

(二) 认知重构:确立非洲经验的主体性

在知识解殖的基础上,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向对认知结构的重构,即确立非洲经验在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使非洲的历史、实践与价值观不再只是案例,而是成为生成概念与理论命题的出发点。加纳学者夸库·丹索与克韦西·阿宁认为,在理论自觉前提下系统研究非洲的事件与过程,可以反过来丰富乃至改造国际关系学科本身。^③ 因此,认知重构首先体现为研究起点的调整,即以非洲经验参与界定问题与组织知识生产。

非洲本土知识生产,并非意在构建“非洲中心主义”,而是要通过争取认知正义,打破单一文明对国际关系解释权的长期垄断,使非洲经验与西方经验并行进入理论核心。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依赖西方大国关系历史与冷战时期大国博弈作为经验基础,因而难以充分解释以宗族、宗教与生计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90.

② 谷翔宇、袁正清:《不只争论: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身份塑造》,《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7期,第35~57页。

③ Kwaku Danso and Kwesi Aning, “African Experiences and Altern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zing Abou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1, 2022, pp. 67~83.

网络等为核心的非洲安全实践,也难以容纳混合治理、跨境社群等在非洲十分常见、却被主权国家范式视为“例外”的政治形式。认知重构的目标,就是通过重新界定何为“常态”的政治经验,揭示西方理论经验的局限性,并将非洲本土知识纳入理论“常态”的规范讨论,从而参与重绘国际关系知识版图。

从这一意义上看,许多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例外”的非洲政治实践,就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具有理论启发意义的“常态”。例如,索马里的“赫尔”制度是一套以氏族长老为中心的多层次争端解决体系,兼具谈判、调解与仲裁功能,强调通过赔偿与和解来恢复社会秩序。1991年,在索马里国家司法体系崩溃之后,“赫尔”仍然是许多地区解决纠纷与维护秩序的首选机制,并在实践中承担起资源分配、暴力约束与跨氏族协调等功能。^①可以看出,安全与秩序并不必然依赖于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国家体系,非国家与次国家制度也可以在缺乏强国家的条件下产生规训功能与合法性。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重构,正是从此类经验出发,发展出更能描述多元政治秩序的概念工具。

近年来,这种“将例外转化为常态”的做法逐步进入一般性理论讨论之中。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森·沙曼指出,非洲奴隶制经验与国家形成之间存在系统关联,非洲统治者所面临的人口与制度条件本身足以改写既有国家形成叙事。^②沙曼与艾谢·扎拉科尔进一步提出,奴隶制在国家建构和国际秩序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意以非洲、亚洲和中东的证据来反驳既有理论中的美欧/大西洋偏见。^③这些研究表明,非洲的历史经验可以改写国家与国际秩序形成的经典叙事,并成为重写一般理论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重要知识来源。

因此,认知重构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在理论起点上,将非洲历史与现实纳入问题设定过程,使其参与概念生成;第二,在规范目标上,通过争取认知正义来削弱白人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使多元经验进入理论核心,而不是

① Mahdi Abdile, “Customary Dispute Resolution in Somalia,”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2, No. 1, 2012, pp. 87 ~ 110.

② Jason Sharman, “Something New out of Africa: States Made Slaves, Slaves Made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 3, 2023, pp. 497 ~ 526.

③ Jason Sharman and Ayşe Zarakol, “Global Slavery in the Making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8, No. 2, 2024, pp. 802 ~ 814.

再造一个新的理论中心;第三,在分析层面,使那些长期被视为“例外”的非洲经验成为重写安全、主权、国家与国际秩序形成等一般性问题的知识生产起点。在这一意义上,21 世纪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性,不止于“反对谁”,而更关乎“从哪里出发看世界”。认知重构有利于非洲学者提高界定问题、组织知识和提出理论命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国际关系知识生产意义上的认知自主。

(三) 权力解放:掌握政治经济的独立性

知识生产是潜在权力关系的结果。权力解放,或者政治经济解放,指通过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结构性压迫,实现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经济资源的自主掌控以及发展模式的自我定义。非洲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需结合非洲大陆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来理解。^①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去殖民的最终目标,就是把知识解放转化为政治经济层面的实质自主。

首先,在政治层面,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论述常以加纳领袖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的经典界定为参照。恩克鲁玛指出,处在新殖民主义桎梏之中的国家并非自己命运的主人。^② 这一论断揭示了形式主权与实质主权之间的矛盾,即便国家已拥有独立的宪法,但制度、安全、军事等关键领域仍可能受外部力量支配。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将主权国家视为具有完整主权和自主能力的基本假定需要被重新审视。几内亚学者西巴·格罗沃吉以纳米比亚等为例,指出当代国际法中一些被赋予普遍意义的原则和规则,实际上受到特定权力关系及欧洲国家历史支配地位的影响。他进一步考察了国际法中不同程度的主权承认如何形成等级差序,并揭示这种差序与殖民历史之间的联系。^③ 由此,主权、自决与干预等基本概念成为需要结合殖民历史与权力关系来重新解释的理论问题。

其次,在经济层面,去殖民的非洲国际关系理论深受埃及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圭亚那历史学家沃特尔·罗德尼等人的思想影响,把发展、不发达问

① Rita Abrahamse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mbling Africa, Studying the World,” *African Affairs*, Vol. 116, No. 462, 2017, pp. 125 ~ 139.

②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6, p. x.

③ Siba N’Zatioula Grovogui, *Sovereigns, Quasi Sovereigns, and Africans: Ra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 ~ 20, pp. 43 ~ 72.

题从国家内部治理的维度提升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问题。阿明将中心资本主义的发达与边缘地区的欠发达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中,认为中心的发达会产生并维持边缘的欠发达。^① 罗德尼认为,帝国主义体系通过榨取非洲的财富并使该大陆的资源无法快速开发,在结构上制造并再生产了非洲的欠发达。^② 可见,经济解放不只是技术性的政策选择,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结构性议题。若货币体系、债务结构与贸易规则的核心权力仍高度集中于全球北方,那么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便难以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能动性。

最后,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还将权力解放提升为重塑世界秩序与全球正义的理论问题。埃塞俄比亚裔美国政治学家阿多姆·格塔丘将反殖民民族主义重新阐释为“世界塑造”,他认为非殖民化是一项重构世界的事业,旨在创造一个免于被支配、平等的国际秩序。^③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政治经济解放目标也不仅是某些国家摆脱某种控制,更是追求一种超越形式主权的物质平等与制度重塑。如果国际关系理论仅停留于文化符号的反抗,而未触及全球权力分配的实质,这种理论就终将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他者化叙事”。知识解放只是基础,最终仍需落实为主权、发展路径与资源配置权的实质性改变,由此才能实现非洲国际关系理论所追求的权力解放。

三、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机制

知识解殖、认知重构与权力解放,确立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去殖民的内核,也重新界定了其认识国际关系的理论起点,但还需要完成理论建构层面的转换。这一转换主要沿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即在本体论上重构非洲人作为完整人类的存在价值,在认识论上恢复非洲知识体系的合法性与自主性,并在此基

①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6, p. 104.

②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Verso, 2018, p. 10.

③ Adom Getachew,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

础上探索与之相应的方法路径,以推动本土经验进入理论建构过程。

(一) 本体论:以关系视角设定理论起点

本体论涉及国际关系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以何者为基本内核。^① 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主权国家视为分析单位,假定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然而,由于殖民性对非洲主体性的腐蚀,非洲被划入“非存在区”,其主权和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中被系统性边缘化。因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路径,首先表现为对“世界由谁构成”“谁可以发声”的本体论反思,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取向,是强调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关系性本体论”。^②

从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关系性本体论植根于非洲长期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生计方式。在前殖民时期,许多非洲社会依托亲属网络、村社联合、跨区域交换体系及多层级权威结构运行,强调协商、互惠与共同体责任,其政治与经济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以单一主权主体加以界定。殖民统治通过划定固定边界、引入等级化行政体系等方式,重塑了非洲社会关系网络,但并未完全消解其运作逻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关系为中心理解社会与政治组织,成为部分学者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从发展演变来看,关系性本体论经历了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提炼的过程。早期研究多关注非洲社会结构的具体运作方式,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反思的推进,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些经验上升为一般性分析框架。非裔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托马斯·蒂库指出,在以关系为导向的群体中,行为体会优先考虑社会整体需求而非个人需求,优先重视群体偏好而非个体利益与目标,同时弱化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特性。^③ 部分研究尝试将关系导向的理解方式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以补充以个体化行为体为核心的既有框架。在具体学术实践中,这一取向出现一

① 李义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31 页。

② Thomas Kwasi Tieku, “Stirring the Pot: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Katharina Coleman, Markus Kornprobst and Annette Seegers, eds., *Diplomacy and Borderlands: African Agency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Ord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212 ~ 234.

③ Thomas Kwasi Tieku, “Stirring the Pot: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Katharina Coleman, Markus Kornprobst and Annette Seegers, eds., *Diplomacy and Borderlands: African Agency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Ord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212 ~ 234.

定程度的理论化与制度化。以莱贡国际关系学派(以下简称莱贡学派)为例,该学派是非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活跃的国际关系认知群体之一,以全球、区域、次国家行为体等为核心分析单位,强调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之间的互动,并通过学术传承,形成较为稳定的学术脉络。^①然而,这些探索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观察视角,但其影响力仍主要集中在特定学术网络之中。

从关键特征来看,关系性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体界定与关系理解方式的调整上,且其带有明确的去殖民性特点:其一,它引入个体、社群、区域组织等多层级行为体,并关注其互动方式。其二,它强调关系本身在构成政治秩序中的基础作用,将互动过程与社会嵌入视为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维度。“乌班图”等非洲本土知识是这一视角的传统起源。乌班图是非洲人对人性的理解,即“人因他人而成为人”,^②也即个体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获得意义。其三,通过将关系置于分析起点,相关研究尝试将不同社会背景中的存在形式纳入理论视野。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析既有理论中对行为体与秩序的界定方式,使非洲经验能够参与国际关系基本问题的讨论之中。由此,关系性本体论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经验基础扩展的一种路径。

跨学科研究亦为关系性本体论提供了支撑。喀麦隆历史学家阿奇尔·姆班贝以“纠缠”描述后殖民社会中多重时间彼此叠加、渗透和交错的状态,强调不能通过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来理解非洲后殖民现实。^③这种对多重关系及其交织状态的关注,与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关系、互动与社会嵌入的理论取向具有相通之处。津巴布韦历史学家萨贝洛·J. 恩德洛武-加特谢尼从权力殖民性、知识殖民性与存在殖民性三个维度分析非洲的殖民性处境,考察殖民主义结束后

① Thomas Kwasi Tieku, “The Leg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5, 2021, pp. 656 ~ 671; Eboe Hutchful, “Why Regimes Adjust: The World Bank Ponders Its Star Pupil,”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9, No. 2, 1995, pp. 303 ~ 317.

② Karen Smith, “Africa as an Ag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ledge,” in Scarlett Cornelissen, Fantu Cheru and Timothy M. Shaw, eds.,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33.

③ Achille Mbembe,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4 ~ 16.

殖民性如何继续作用于权力结构、知识生产与主体存在。^① 博茨瓦纳学者巴格勒·奇利萨等主张以乌班图等非洲本土哲学为基础发展“关系性本体论与认识论”,并据此重构研究与评估方法,以推动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② 总体而言,非洲语境的关系性本体论以关系、互动与社会嵌入重新理解行为体及其存在方式,突破了以孤立实体和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本体论预设,使非洲社会长期形成的关系性经验得以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问题讨论,构成非洲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去殖民性的一种重要路径。

(二)认识论:以“认知自由”塑造理论核心

国际关系认识论主要涉及如何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的知识、何种知识主张能够成立,以及认识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等基本问题。不同的认识论立场由此形成对知识来源、客观性与有效性标准的不同判断,并影响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和解释世界政治的方式。^③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首先涉及“谁能说话、用何种概念与材料说话、在什么权力关系中说话”的问题。对非洲学者而言,认识论转向意味着不再把西方理论视为唯一的标准,而是把非洲的历史经验、思想资源和社会实践当作提出问题、建构概念和评价理论有效性的出发点。

在当代,加特谢尼将认识论系统化为以“认知自由”为核心的去殖民框架。他将“认知自由”界定为一种权利,即人们有权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出发,不受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自由地思考、构建理论、解读世界、发展自身的方法论并进行书写。他强调,只有首先解决“认知自由”的问题,非洲才可能实现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自由。认知自由能使非洲人民重新获得在人类历史中作为独立行动者的核心地位。^④ 与此相对,他提出“认知帝国”一词,用来指把欧洲经验过

①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Coloniality of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Myths of Decolonization*, Dakar: CODESRIA, 2013, pp. 7 ~ 9, pp. 20 ~ 21.

② Bagele Chilisa, “Relational Ontologies and Epistemologies That Are Informed by Our Philosophies: Inaugural Ubuntu Annual Lecture 2022,”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14, No. 3, 2024, pp. 158 ~ 165.

③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 ~ 18.

④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Epistemic Freedom in Africa: Deprovincial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Boca Raton: Routledge, 2018, pp. 2 ~ 3.

度包装为普遍知识、同时贬抑其他知识形态的结构性权力。阿明将欧洲中心主义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意识形态扭曲之一”,^①而加特谢尼将认识论去殖民化视为一项双重任务,即“将欧洲地方化”和“将非洲去地方化”。^②“地方化”和“去地方化”的过程密不可分,它们旨在探讨,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欧洲思想”的成果,应如何被界定为人类共同遗产,而不是仅属于某一地理中心的思想产物。由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转向,是要从根本上拆解“认知帝国”,揭示既有知识体系中关于经验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权力机制,并推动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知识来源与评价标准的重新审视。

在这一框架下,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体现出主体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第一,它把非洲从被研究的“对象”提升为理论生产的“主体”。刚果学者瓦伦丁·伊夫·穆迪姆贝分析了殖民知识生产如何将非洲建构为差异与他者,并通过对“殖民图书馆”的批判,揭示既有知识体系对认识非洲的持续限制,进而探索从非洲经验与知识传统出发重构知识的可能性。^③乌干达政治学家、泛非主义者达尼·纳布德雷使用“非洲学”来指代一种充分考虑非洲历史、文化与语境,并以非洲宇宙观为基础的知识与智慧哲学。^④这些研究表明,认识论去殖民的首要步骤,就是让非洲成为自主理论的发声者。

第二,它强调知识多元性与南方认识论,反对单一普遍理论对世界经验的抽象同质化。博阿文图拉·桑托斯指出,“南方认识论”旨在使受压迫的社会群体能够按照自身的方式表述世界,并从反抗压迫的实践中识别和确认被主导认识论排斥的知识。^⑤借助这一概念,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莱贡学派的认识论定位。蒂

①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Modernity, Religion,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p. 34.

②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Epistemic Freedom in Africa: Deprovincial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Boca Raton: Routledge, 2018. p. 3.

③ Valentin-Yves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 ~ 5, pp. 167 ~ 186.

④ Dani W. Nabudere, *Afrikology: Philosophy and Wholeness: An Epistemology*,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1, pp. 17 ~ 18.

⑤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4, pp. 1 ~ 2.

库强调,该学派在理论上是去殖民的,在认识论上扎根于南方认识论,在方法上偏好定性研究、以实践为导向,并以“全球南方取向”和“追求全球权力的更公平分配”为规范目标。^① 莱贡学派还认为“话语”实则是对全球南方民众进行控制、剥削、虐待与压迫的间接机制之一。^② 这表明,非洲国际关系的认识论把知识视为历史斗争的产物,推动知识生产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转变。总体而言,认识论转向是知识解殖与权力解放之间的关键枢纽,只有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从客体到主体的转换,非洲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在本体论和政治经济层面真正推动国际秩序的去殖民化。当然,“认知自由”的认识论目前仍是一种规范性目标,其能否转化为稳定的知识生产机制,仍取决于理论创新程度和课程体系、出版平台与学术网络等一系列制度条件的发展。

(三) 方法论:以本土知识建构研究工具

方法论不同于具体研究方法,后者主要涉及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具体技术,而前者关注研究设计能否支持研究者从经验材料中作出合理推论并形成可靠结论。^③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受到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强调建模、假设检验与定量分析。这在增强理论系统性与可检验性的同时,也可能弱化对历史语境、地方经验的关注。对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将方法论反思纳入知识去殖民进程,通过参与式研究、本土知识转化与资料来源拓展,思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知识来源与知识标准之间的关系,使非洲经验更充分地进入理论建构过程。

第一,方法论从外部观察转向参与式、本土化的研究设计。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学家克劳德·阿克就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出发,尖锐批判由外部专家主导的发展路径。他指出,非洲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未真正把人民置于中心,而是服务于外来利益结构,因此发展在非洲从未真正摆上议程。^④

① Thomas Kwasi Tieku, “The Leg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5, 2021, pp. 656 ~ 671.

② Yaw Manu, “Mainstays of the African Revolution,” *The Pan-Africanist Review*, Vol. 1, No. 2, 1964, pp. 17 ~ 31.

③ Perri 6 and Christine Bellamy, *Principles of Methodology: Research Design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SAGE, 2012, p. 2, pp. 7 ~ 9.

④ Claude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p. 1.

这意味着,研究非洲政治经济若仅依靠外部建构的变量和模型,而不去理解并吸收普通民众的真实处境和经验,那么这种研究就是在持续巩固不平等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加特谢尼进一步把这种立场推向去殖民方向,明确主张非洲研究应当“与非洲人一起做,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研究对象”。^① 在这里,“谁来设定问题、谁被允许说话、谁被当作被观察的对象”成为去殖民政治的一部分。

第二,方法论自觉地把非洲哲学与本土知识转化为研究资源。在具体操作上,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尝试将“桑科法”“帕拉维尔”和“盖卡卡”等本土概念转化为方法论原则。源于西非阿坎传统的桑科法,意为“返回并取回”。^② 近年来,学术讨论将桑科法视为理解非洲社会与政策议程的关键,其核心思想是回到历史,修复被文字档案所遮蔽的经验,由此改变国际秩序叙事的走向。帕拉维尔是一种在树下以公开商谈、长程倾听与达成共识为目标的政治形式或议事习俗,其核心特征包括:开放包容的全员协商、非精英化的调解者角色、兼顾传统与当代情境的论证逻辑、追求社区和谐的目标。^③ 相关研究不断重申帕拉维尔的现代意义,提醒学者在方法论上避免把对话简化为访谈问卷,而应将长时段且蕴含伦理意涵的协商过程视为重要资料来源。卢旺达大屠杀后的“盖卡卡”法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盖卡卡意为“草地上的司法公正”,源于卢旺达基层共同体的纠纷解决传统,后在大屠杀之后被国家制度化,用于处理大规模暴力之后的责任追究、真相揭示与社会和解。^④ 它将公开陈述、社区参与、加害者认罪与共同体修复结合起来,使正义成为重建秩序与恢复社会关系的过程。盖卡卡表明,非洲本土概念能够在国家重建、社会治理中转化为制度性语言,进而为理解秩序提供不同于西方法治模板的解释框架。

第三,口述传统的学术化转型,挑战文献中心主义的史料观。非洲的口述传

① “A Resurgence of Decolonisation: We Need To Do African Studies with Africans-An Interview with Sabelo Ndlovu-Gatsheni, Part 1,” June 15, 2022, <https://antipodeonline.org/2022/06/15/interview-with-sabelo-ndlovu-gatsheni-part-1/>.

② Jennifer Slater, “Sankofa—the Need to Turn Back to Move Forward: Addressing Reconstruction Challenges that Face Africa and South Africa Today,” *Stud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Vol. 45, No. 1, 2019, p. 1.

③ Theodros A. Teklu, “African Palaver as a Model of Multiethnic Recognition,” in Theodros A. Teklu, ed., *Moral Pedagogies for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113 ~ 134.

④ 刘海方:《卢旺达的盖卡卡传统法庭》,《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56~62页。

统作为活态历史记忆的载体,涵盖谚语、传说、仪式、歌曲和叙事等多种形式;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突破了“史料即史学”的传统观点,更开辟了理解非洲政治实践的本土路径。在处理记忆的主观性与史实的真实性问题时,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采用“三角互证”的逻辑,即不单纯依赖单一的口述来源,而是将其与物质档案、田野调查相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学者阿拉巴·辛普森 2001 年开展的“奴隶之路”项目便是典型案例。这是关于尼日利亚、加纳、贝宁等与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相关的研究。虽然研究依赖口述传统,但并非随意采信,而是采用深度访谈法,并辅以博物馆、古迹等档案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交叉验证。^① 这种通过实地调查和多源证据形成的活态档案表明,经过严格的方法论规制,口述传统亦能够成为解释政治行为深层逻辑的有效工具。总体而言,只有当研究路径摆脱对西方范式的依赖时,非洲才能通过自己的方法论,在全球知识分工中争取真正的主体地位。然而,这些方法论创新虽展示了非洲知识实践的可能路径,但其在主流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扩散与制度化程度仍然有限。

四、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困境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通过重新诠释核心概念、拓展研究议程、引入本土经验等方式,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修正路径,有助于削弱单一西方范式的垄断,推动学科朝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方向演进。然而,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制度化的话语结构,在知识生产机制与学科权力分配等层面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约束。

(一) 外部困境:知识生产地位失衡

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霸权通过知识生产中的话语优势与制度安排得到维系,并与全球政治中的权力不平等相互交织。在这一过程中,非洲的世界观容易被贴上“本体论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标签,从而被排除在“正统”理

^① Alaba Simpson, “Oral tradition and the slave trade in Nigeria, Ghana, and Benin,” *African Diaspora Archaeology Newsletter*, Vol. 10, No. 1, 2007, pp. 5 ~ 44.

论之外,非洲经验由此难以获得与西方经验同等的知识生产地位。^①

首先,在话语层面,非洲长期被预设为理论之外的经验对象。在国际关系学界,一种普遍看法是:非洲行为者(国家、组织和外交官)只是由全球北方富裕国家设计的国际规范和实践的消费者。^②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华尔兹认为:“构建一个基于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如同基于某一经济部门的次要形式构建寡头垄断竞争的经济理论一样荒谬。”^③ 这类论断正体现了将少数大国经验视为主要理论来源的思维前提。在这一认识中,大国与小国的区分不仅是能力差异的描述,也被进一步用来界定谁有资格成为建构理论的经验基础、谁只能作为验证他人理论的次要案例。

其次,在制度层面,知识生产活动高度集中于全球北方,使非洲理论更难以进入学科主流。印度学者纳夫尼塔·贝赫拉指出,全球化固然扩大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但知识生产的地点与方式并未随之同步多元化,国际关系知识的创造仍主要受西方启蒙思想及其数百年帝国主义历史的塑造,这使得许多国家在重构自身知识体系时持续遭遇结构性约束。^④ 在国际关系学界内部,这种不平等具体表现为,顶级期刊编辑委员会和审稿人高度集中在欧美院校,偏好实证主义方法与西方中心叙事。相应地,非洲经验往往被要求为既有理论提供案例,而不是被视为提出新问题、生成新概念的起点,从而强化了对非洲“被动接受者”的刻板认知。^⑤ 话语优势与制度限制相互作用,使知识霸权得以延续,也构成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学科主流的重要外部障碍。在这一知识生产格局下,即使非洲学者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提出新的理论探索,也较难改变既有学科对理论来源与知识标准的基本认定。

① Amanda Coffie and Lembe Tiky, “Exploring Africa’s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rica Spectrum*, Vol. 56, No. 3, 2021, pp. 243 ~ 253.

② Ibid.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p. 72 ~ 73.

④ Navnita Chadha Behera,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5, 2021, pp. 1579 ~ 1597.

⑤ Amanda Coffie, Lembe Tiky, “Exploring Africa’s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rica Spectrum*, Vol. 56, No. 3, 2021, pp. 243 ~ 253.

(二) 内部困境:学术体系的路径依赖

非洲学界对西方理论框架的学习和运用,是进入国际关系学科讨论的必要基础,也为比较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资源。然而,当课程体系、学术评价与研究规范长期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要参照时,这种学习和借鉴也容易固化为研究惯例,使非洲学者更多地在既有理论框架内提出问题和组织论证,而较难从本土经验出发形成自主的问题意识与概念创新。因此,外部知识规范逐渐转化为非洲学术体系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

非洲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首先体现在非洲大学体系对西方课程与知识规范的复制上。尼日利亚学者法莱耶在分析非洲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时指出,非洲独立之后,非洲的大学延续了殖民时代的知识格局,仍然是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代理。他认为,多数大学的教学与阅读文本强调西方哲学和欧洲中心的现实,欧洲语言成为“威望语言”,而非洲语言被贬为“方言”,大学课程反映的是西方经验。^①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非洲学生从一开始就更多接触欧洲历史、欧洲政治思想和以威斯特伐利亚为中心的理论框架。这种训练容易使学生习惯在西方框架内提出问题和组织论证,从而限制自主理论生成的空间。例如,2007 年,尼日利亚国际关系本科专业的 45 门课程中,仅 6 门体现非洲经验,其余课程均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②即便在 2023 年版的标准中,本科 28 门课程里也仅有 5 门直接以非洲或尼日利亚命名,另有 5 门部分纳入非洲议题。^③这样的课程结构,使学习西方理论成为进入学科的前提,而非洲经验难以成为组织理论训练的起点。

其次,路径依赖还体现在非洲学者对既有学术评价标准和研究规范的适应上。为了进入主流学术讨论,非洲学者往往需要使用既有学术共同体能够识别的理论语言、研究议题与方法规范。这种适应本身是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但当既有标准成为评价研究价值的主要尺度时,研究者便更容易沿用已有

① Olukayode A. Faleye,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cquiescence and Responses,”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Studies*, Vol. 5, No. 2, 2014, pp. 81 ~ 90.

② Ibid.

③ National Universities Commission, “CCMAS: Social Sciences (New)-2023,” <https://nuc-ccmas.ng/downloads/>.

理论框架,而较少从非洲经验出发重新界定问题、提出概念。同时,部分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非洲学者更多进入欧美学术网络,逐渐远离非洲本土问题和本土理论创新。本土研究力量的削弱,进一步加深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在知识生产上的依附性。此外,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会议、期刊与合作网络高度集中于欧美机构,这使非洲学者更倾向于在既有学术网络中寻找对话对象,从而在无形中强化了既有理论语言与研究路径的再生产。因此,外部知识规范逐渐转化为学术实践中的研究习惯,使路径依赖在议题选择、理论语言和方法运用中得到延续。

(三) 学科困境:理论成果整合不足

过去二十多年间,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学者们不仅有力批判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地域偏见,也不断从非洲本土的历史经验、政治实践与哲学思想中发掘新的理论资源,以寻求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解放。围绕非洲能动性、后殖民视角、非洲现实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多,并逐渐形成若干相对集中的议题领域。随着相关研究不断积累,如何整合已有理论成果,以及如何突破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非洲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存在整合缺位的问题。对于这一高度多元、跨学科且快速演化的领域而言,系统性综述或理论综合类的专著与手册仍然相对有限。缺乏总结意味着非洲对现有知识状况、需要填补的空白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的理解是零散的。^① 2001年,凯文·邓恩与蒂莫西·肖主编的《非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集中展示了非洲经验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核心范式的挑战,可以视为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走向自觉的一个早期节点。^② 2014年,蒂姆·穆里西主编的《非洲国际关系手册》出版,该手册具有一定的综合性。^③ 2015年,保罗-亨利·比肖夫、克维西·阿宁和阿查亚编著的《全球国际关系中的非洲:走向

① Thomas Kwasi Tieku,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Vol. 121, No. 484, 2022, pp. 487 ~ 499.

② Kevin C. Dunn and Timothy M. Shaw,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③ Tim Murithi, ed., *Handbook of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4.

理论与实践的新路径》从全球国际关系视角讨论非洲在全球理论重构中的定位,但其本质仍属论文集,并非全面系统的知识集成。^① 整体来看,尽管上述论著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意识与范式反思,但迄今仍缺少一部能够总其成、指其隙、明其向的综合性理论著作。整合缺位至少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其一,领域知识的整体图景仍较为碎片化,许多新研究不得不重复进行小范围文献梳理,难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累积性认知;其二,关键理论空白与重复性研究不易被及时识别,导致学术资源分散、研究议题失焦;其三,这种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从积累走向成熟,使其在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时较难形成清晰、自主的学科叙述。因此,对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阶段性梳理与系统反思,是其走向学科成熟的重要条件。

其次,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科定位上仍受到区域研究身份的限制。石斌指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在于理论探索与历史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脱节,这也解释了为何非洲经验虽不断积累,却仍难转化为具有广泛承认度的理论资源。^② 牛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丽塔·亚伯拉罕森认为,在当代大学制度中,非洲研究及其学者往往被定位为“关于非洲的专家”,而非国际关系、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家;他们站在学科边缘,观看学科从身旁经过,只是在边缘偶尔作出贡献。她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科学的象征性资本结构中,理论几乎总是比经验研究拥有更高的象征资本,可普遍化的理论建构往往比扎根于具体场域的经验研究更受重视,这使得非洲研究即便经验丰富,也很难在理论层面获得与欧美学派相当的地位。^③ 因此,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形成更具累积性的知识,并使非洲经验真正参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讨论,构成其进一步发展需要面对的问题。

① Paul-Henri Bischoff, Kwesi Aning and Amitav Acharya, eds. *Africa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erging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5.

② 石斌:《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困境与出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③ Rita Abrahamse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mbling Africa, Studying the World," *African Affairs*, Vol. 116, No. 462, 2017, p. 128.

五、结 语

在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源于特定区域的经验,如何转化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资源。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表明,理论的普遍性并不必然建立在对区域差异的抽象化处理之上,也可以产生于不同经验之间持续的比较、检验与对话之中。非洲经验之所以具有理论价值,是因为那些长期被视为“例外”、甚至不具有理论意义的政治实践,同样可以成为提出问题、形成概念和修正理论的知识来源。由此,地方性经验既可以构成理论解释的边界,也可能成为发现既有理论边界并推动理论发展的起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深层意义,是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知识如何产生、哪种经验具有理论价值以及理论的普遍性如何形成。如果不同历史经验都能够提出具有解释意义的问题,那么理论的普遍性就不能简单地从某一地区的历史经验出发向其他地区延伸,而应在不同知识传统与政治实践的相互检验中逐步形成。非洲的理论探索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其重要意义在于确认不同地区不仅具有被理论解释的价值,也具有平等参与理论建构的资格。因此,全球南方不仅是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行为体,还构成了认识世界政治和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基础的重要来源。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最终取决于不同地区能否共同参与问题的提出、概念的形成与知识的评价。只有当理论的普遍性建立在多元经验之间持续的比较与对话之上,“全球性”才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知识的内在属性。

【责任编辑:龙菲】